

# 學門發展趨勢與展望： 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 人類學及族群研究

編輯部\*

主持人：傅仰止（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與談人：熊瑞梅（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楊志堅（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教授）

鄭伯壘（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黃樹民（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

## 主持人傅仰止教授

謝謝大家的參與，這是社會科學第二個場次。在座的與談人分別是社學會熊瑞梅老師，教育學楊志堅老師，心理學鄭伯壘老師，人類學黃樹民所長。這幾位與談人都當過學門召集人，對各學門的發展都非常清楚，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聽聽他們對各學門展望的報告。

## 熊瑞梅教授（社會學）

我想今天既然是慶祝《簡訊》20 年，就把社會學門曾刊載在《簡訊》的文章做了搜集，從這裡頭去思考，20 年來這份刊物對社會學門有什麼樣的貢獻。從早期章英華做了社會學門成就評估（3 卷 1 期，頁 20-30，2000），張苙雲做社會學熱門與前瞻（8 卷 4 期，頁 1-7，2007），到張晉芬做社會學熱門與前瞻（18 卷 1 期，頁 37-46，2016），我認為《簡訊》有兩塊報導做得非常好，一個是期刊評比，另一個是熱門與前瞻議題。我們都知道，各學門會做期刊評鑑，但評鑑後

---

\* 本文為現場錄音轉錄文字，經與談人審訂。



圖一：左起黃樹民教授、傅仰止教授、熊瑞梅教授

不見得有人會去看，如果藉由《簡訊》平臺做刊登的話，因為內容已經濃縮了報告精要，看的人就相對多了。此外，我記得主持人傅教授當處長時，曾召集做過期刊評鑑的學者，討論並決定由人社中心把電子期刊資料庫建立起來，直接用大數據去搜索引用次數，及專家調查評審等多項指標，發展成今天的評鑑方式。因此我認為《簡訊》對於這兩個議題的報導還有宣傳，貢獻良多，也因為學術界有了這個交流平臺，對很多學者來說，他會比較清楚個人研究在學門發展方向的相對位置，也比較能釐清未來可以往哪些路走。接下來，分別就刊載在《簡訊》的 3 篇文章做一簡述。

章英華在 2000 年做的社會學成就評估提到，當時社會系只有六所，現在社會系有十所，加上中研院社會所；另外從 1981 年東海成立博士班以來，到現在是 4 所，也因為有了博班，臺灣的社會學從 1980 年開始就大量呼籲本土化，讓這個知識建構在社會學的發展形成重要一環。可是最近我看到社會學博班招生困難，去年臺大、政大還有清華都是零報名，加上未來十年社會學界會有大量教師退休，我覺得整個社會學門會產生很大的危機。其次，章英華的報告裡也指出，社會工作跟社會福利已經完全從社會學系脫離。而張荳雲 2007 年的熱門與前瞻報告，使用科技部的計畫來做分類，也用臺灣和科技期刊做調查，熱門議題比較是質化、量化、非實證。比較有趣的是 1980-2002 年量化的論文偏多，那個時代的學者基本上受的是量化訓練，大概從八〇年代以後，在美國受到的質化訓練就越來越多，因此 2000 年以後質化比量化多很多，現在這個現象還是蠻明顯的。至於社會福利早期比較強調論述，後來隨著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越來越多，就用實證研究來做政策的討論。傳播學也是一樣，1970 和 1980 年代論述

的論文偏多，1990 年代以後，量化及論述的論文各占四成，質化二成。在社會學門，早期博班學生都做理論的研究，但這種趨勢在 1995 年以後就不斷地衰退。家庭與婚姻早期也非常多人研究，現在也相對減少。組織制度產業研究也逐年下滑，公民社會研究上升，文化研究的發展趨勢非常有趣，在 1990-2007 已經有增加的趨勢，2007 年以後文化研究增加的更快。性別研究曾經在 1997-2005 很快的增加，但又很快的下降。然而有個議題在全世界始終保持熱門，那就是社會階層，不管在什麼時代，即使是在美國期刊、臺灣的期刊，社會階層一直都很重要。張晉芬在 2007-2016 做的熱門議題顯示，最多人做的是文化研究，政治社會學居第二，健康社會學第三。健康社會學以前是沒有的，但隨著少子化、老年人口越來越多，健康也變得越來越重要。比較有趣的是，《國際社會學刊》是國際社會學會的核心刊物，他們對社會學的關懷很不一樣，比如對理論的關注，這在臺灣已經越來越少學生去投入，可是在很多國家，比如印度還是受到相當的關注。

我從最近張晉芬剛做完的社會學門前瞻議題做了反思。從調查報告中會發現，在科技部計畫所做的研究議題，相對於網路問卷調查議題，許多的社會議題仍未被實際投入研究，比如社會企業、跨國比較、方法研究、災難研究、性傾向與同志、貧窮，這些都是我們身邊能感受到的議題，可是在研究計畫的比例卻沒有那麼的高。此外，目前科技部、教育部在推社會實踐與大學社會責任，可是要做好的社會實踐需要理論與經驗的累積性，但如果做很多社會實踐，就沒有辦法很深入地投入理論的探索。同時，全世界的科技部都在獎勵跨領域研究，要怎麼跨領域？以我自己為例，我跟心理學家、經濟學家做心腦信任研究，就覺得跨領域是一件真的很辛苦的事，因為每個學術領域都有它的保守度，所以要花很多心力去包容、理解其他領域的邏輯。二十一世紀是一個變化太快的世界，在知識的典範上給我們無限的挑戰，Duncan Watts 曾經在 *Sciences* 寫了一篇文章，提到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科學就是一個跨領域科學，因此我們不能再本守自身的學門，應試著去改造我們的高等教育，提供更多空間讓學生自主學習，投入多元的基礎知識訓練，才能有利於後續跨領域的知識整合與創造。

## 楊志堅教授（教育學）

一直以來，教育學其實都有兩個很重要的次領域：體育學門及圖書資訊學門，運用兩個次領域的專長也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訊息給今天所關注的「發展趨勢與展望」當參考。

首先，我個人不太相信、也不願意鼓勵去追逐「熱門」、「趨勢」的題目或類似的做法，舉個例子來說明：所有的研究都是開始於文獻回顧，文獻所記錄的當然是過去的事情，不是未來；而拿來當論辯基礎的田野調查、統計資料也都是發生在過去，頂多只是很接近現在的過去，當然也不是未來的真實情境。這就好像我們想去開車，要向前行，但是擋風玻璃全部是黑的看不到，能看到的只有後視鏡，也就是已經發生的文獻、調查、統計資料，但這都是過去發生的事，或許可以利用過去的「歷史」去猜測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但這些既然是「猜測」，自然也沒有人可以保證如此產生的議題，未來能夠有多少確定的影響力？

例如：好幾年前，在臺灣教育學界我們很「流行」談建構主義跟傳統教法的論戰、甚至辯論，當時很多人認為這就是熱門、這就是趨勢，但是後來呢？前一陣子，則看到一些計畫書在鼓吹、倡議「翻轉」；有一陣子則是流行「霸凌」議題，有段時間分析臺灣學生在 PISA、TIMSS、PIRLS、ICCS 的教育表現也有一些擁護者，這段時間則是因應政府的「南向」政策，相關研究議題的計畫書就常出現。但是，把時間稍稍拉長，當時因追求熱門、跟隨趨勢所做的計畫、所寫的論文，如果不持續探究、創新現在還會有影響力嗎？或者經典還是經典，而後人的趨炎附勢，終究還是被時間所沖刷殆盡？

今天是《簡訊》的 20 週年慶祝會，我想就把曾在《簡訊》登過的 2 篇文章拿出來講有關於影響力與趨勢的關係。

從 SCI, SSCI 的引進開始，大家陸續注意期刊論文不同的影響力指標，大概 7、8 年前，開始有人說期刊的壽命很短，是不是應該看長期影響，當時我寫〈長



圖二：楊志堅教授

期穩定引文分析方法與臺灣引文資料庫之實徵應用〉(15 卷 1 期, 頁 16-23, 2013)。在那篇文章我寫了這段:「Henry Roediger (2013) 現職為美國心理科學學會出版委員會主席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Publications Committee), 他有句很值得所有從事科學研究及學術發表工作的同仁們仔細體會的話, 他說 “I have always done my best to feign deep interest about IF’s.”。IF 即 Impact Factor (影響指數) 為近年國內學術社群相當關心的議題, 但是 Henry Roediger 卻說他必須「努力假裝」對這議題很感興趣? 今天在座應該也有期刊的主編和審查人, 如果連這位主席也不過是要假裝關心他期刊的 Impact Factor 的高低, 那麼在場的各位還需要擔心自己所編刊物的 Impact Factor 高不高嗎?

事實上, 圖書資訊學門的學者們大抵都同意 IF 的計算基準並不是不能更動的, 也有相關研究建議出各種計算的方式。常見的 IF 計算方式是以兩年為期計數期刊或論文的被引用率 (citation rates), 也有計算方法是以五年為期。但特別是在人文社會領域, 真正有影響力的文章 (經典) 是否能在兩年或五年內就可以被確認嗎? 或者還是需要更長的時間? 如果是, 那目前我們所關心的這些兩年或五年為期的 IF 指標的意義何在?

所以, 在那篇《簡訊》的文章中我做了一個表格, 這是國家圖書館跟很多位老師們所共同推動的 TCI 資料庫 (Taiwan Citation Index) 底下, 所產生出來的資料分析結果。從這個圖可以看出我們的引用比例, 以長時間來看, 很不均勻; 在短時間內, 左邊就是最近一兩年, 一直向右邊伸展就是很久遠以前。左、右兩邊並不對等、也不相稱。

這個圖也就是在說, 在某一個固定時段中, 「常被引用的文章多數是發表於最近一、兩年內的新文章」, 「時間距離很遠的舊文章, 被引用機會相對較低」。但是, 如果時間距離現在很遠的舊文章, 作者還願意引用, 那代表什麼意思? 熱門文章或許在短時間確實可以引人一時的注目; 但是談影響力, 究竟是一時的熱門重要還是深植人心長遠影響力重要?

很可惜的是, 現在的各式升等或獎勵制度底下, 好像並不太關心人們十年前發表的論文, 反而聚焦於這兩年、五年內的短期指標, 只是十年前的論文若還可以被引用的話, 能否也可以給予適當的肯定? 將這個圖的意義往下延伸, 我希望未來的影響力計算或許可以忠實呈現以下兩點:

特徵一: 能反映各年的引用機率是不均等的, 就如同分層取樣時, 必須考慮各個分層的大小可能不相同。

特徵二：每一年的引用數都是重要的，也就是強調長期且穩定的概念，最近一、兩年內的引用情形與九年、十年前的引用狀況都必須列入考慮，並隨當年不同的引用率給予不同的權重。

也就是說某位學者在時間很遠以前被引用的一次、兩次，應該要考慮給予相對更重要的關注或肯定。因此，我根據這些概念，設計了 LCS (Longitudinal Citation Scale) 的引用指標，這個指標後來被國家圖書館的 TCI 資料庫引用。

在這個概念下，若要講長期，那專書的壽命會不會比期刊論文更長一點？這也符合了後來許多老師們所大力推動的「專書影響力」的精神，因此我繼續寫了另一篇《簡訊》的文章〈The Impacts and Values of Book Reference-Citation in Citation Networks 引文網絡中專書的影響與價值〉(15 卷 4 期，頁 46-55，2014)。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主要想了解「書」在文獻「引用網絡」中的價值及影響力。過去或現行的 ISI 在計算 Impact Factor 的時候，講的是期刊跟期刊之間的引用，以及期刊跟書之間的引用，那麼書引用期刊在 ISI 是不計算的，也就是我們寫的書會不會被引用，以及書在整個引用網絡裡面的狀況是怎麼樣，其實並不怎麼受到關心。

於是，我整理了 TCI 資料庫中「語言學門」裡面的書跟期刊彼此間互相引用情況，然後做出文獻引用網絡。感謝國家圖書館的同仁花了很多時間把專書部分的引用資料補充進來。最後，從書跟書互引、書引用期刊全網絡來看，可以證明這兩個前、後的引文網絡，其實具有很大的差異，這是用社會網絡的初步分析，未來可以利用大數據 (big data) 的分析方法進行相關的後續研究。

最後跟大家分享個人的一點經驗，兩張照片 (圖三)，作為結尾。有一年我到德國科隆參加研討會時，剛好遇到德國的特殊節慶日 Karneval，這個節日有



圖三：Karneval, Düsseldorf, 2016

點類似美國萬聖節的活動，大家努力扮演跟自己平常不一樣的外型、也跟別人不一樣的裝扮，大概就是越不一樣、越引人注目為目標。結果，我在人群中發現我自己最特殊，因為我什麼都沒做，反而跟在廣場上努力想跟別人不一樣，而爭奇鬥艷、奇裝怪服的人，很不一樣，相對之下，那些過度裝扮的人反而變成很一樣。所以我想 Be yourself! 最有特殊性。

最近臺灣學界在學術倫理問題的處置上有一些不小的紛擾，不過我想這應該不是只發生在臺灣，要不然英國知名作家 Philip Pullman 不會說過這一句話 “It’s only through honesty and courage that science can work at all.”

或許我們不需要想太多，成功的科學家真的就只需要誠實跟勇氣就可以成就的。堅持初衷、相信自己，趨勢與發展就會由我們帶起，我想 Philip Pullman 這句話應該是可以很受用的。

## 鄭伯璦教授（心理學）

《簡訊》特刊有 2 篇關於心理學的文章，一篇是神經心理學的發展，另外一篇是本土心理學的發展。這兩個方向可以說是臺灣心理學在過去三十年很重要的發展路線。藉由今天要講的主題，剛好可以把臺灣心理學的研究做一個簡單的回顧，並由此提出一些面對未來的想法。

到目前為止，心理學在臺灣的發展剛好大約是 90 年，接近一個世紀。對一個學科的發展來講，這是非常短暫的時間。當初臺大前身的臺北帝大成立心理學講座時，採取的是研究室的方式，而非學系，顯然是研究重於教學。雖然規



圖四：鄭伯璦教授

模不大，但也留下不少的學術財產，包括圖書 4,000 多冊，雜誌 1,500 冊，以及實驗儀器 150 件，而扎下相當好的開展基礎。所以民國 38 年傅斯年當臺大校長時，就要求成立心理系，蘇薌雨先生則成為創系系主任，首開臺灣心理學系開辦的先河。在研究方面，為了因應大量士官兵遷移臺灣，必須加以分類安置，而執行了一項重要的研究計畫，即國軍士官兵的心理素質衡鑑，並在美援的協助下，將心理測驗與精神鑑定引入人事管理領域中。

在研究人才的培育方面，臺大心理學系第一屆畢業生中有兩位重要的系友，劉英茂先生與柯永河先生，他們進一步打造了臺灣心理學發展的基礎，也影響了其他學校心理系的設立與辦學方向，因為不少師資都是出身於臺大，不管是在臺灣或國外取得高級學位。剛才熊老師提到社會學博士班名額在減少之中，我們系所目前並沒有這個問題，報考的人還是相當踴躍，錄取率也不是很高。

除了劉英茂先生、柯永河先生之外，楊國樞先生也是非常重要的開創奠基人物。劉英茂先生最大的成就是中文認知歷程的語言心理學研究，他帶出的學生包括鄭昭明、曾志朗、黃榮村、吳瑞屯及梁庚辰教授，目前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也是在他的學生輩的推動下，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的心理學研究領域，探討了包括心智運作、神經機制、大腦結構，以及對人類行為的影響等等的議題。柯永河先生則扎下了臺灣臨床心理學發展的基石，成為臺灣心理學重要的研究與應用領域。921 大地震發生後，臨床療癒更應用在災難後的重建上，並促使災難心理學在臺灣生根茁壯。

楊國樞先生則是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本土化的重要推手，他把哲學、人文學通通包含在裡面，並組織研究團隊，執行教育部、國科會追求卓越計畫等的大型研究計畫，促使華人本土心理學有重大的進展，他更創立學會、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開辦訓練班，以及出版期刊等等，使得此新興領域進展快速，國際影響力很大，像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都曾專刊介紹臺灣本土心理學的發展。直到目前，其影響力還很大，且成為凝聚海峽兩岸三地與海外華人的心理學研究方向。其他的學者如余德慧開創了華人人文心理療癒的路線，而對臨床心理學注入了人本關懷；黃光國提出的中國人權力遊戲的模式成為重要的人際關係研究文獻，並在理論上有所突破，且應用於心理治療與心理輔導的領域；我做的是領導，並在華人本土心理學的思維下，帶出了家長式領導的模型，成為當前新興的領導理論之一。

因而，過去臺灣心理學的研究與發展顯然還差強人意，雖然學科規模並不大。接下來的問題是，從臺大心理系設立到現在，七十年過去了，臺灣多數的

心理學系也多依照臺大的架構設立。但面對未來，臺灣心理學研究該何去何從？這除了是臺大心理學系的問題，也是臺灣心理學的問題。究竟心理學要往自然科學靠攏？還是往人文學科靠攏？還是堅持社會科學的特色？目前神經心理學越來越往自然科學靠攏，做文化心理學研究的一些人則往人文學靠攏，心理學究竟該怎麼辦？我常在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有沒有可能在心理學統整完成，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因為臺灣心理學的研究幾乎是跟著臺大走，所以臺大如果統整成功，就有希望；如果整合失敗，那麼心理學在臺灣恐怕就要裂解了。裂解的意思是，做神經心理學、臨床心理學的人往生命科學院、醫學院靠攏，社會心理學、人格心理學成為社會科學院的一員，然後人文心理療癒、文化心理學往文學院靠攏；工商與組織心理學，投入管理學院的懷抱；人因工程學或工程心理學則成為工學院的一個分支，於是心理學就四分五裂了。

不管就歷史淵源或是學科本質而言，當然是希望不要裂解，因為畢竟處理與研究的都是人類行為的議題。站在這樣一個角度之下，面對未來的趨勢也許有幾個可能的研究展望與方向：

第一，多元文化心理學與族群融合。這個議題非常重要，因為做本土心理學的目的並非只想突顯華人文化與心理跟其他族群有什麼不同，然後堅持差異；而是異中求同，努力促成文化融合與族群融合。也就是說，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更應重視文化與情境差異下的種種融合，強調各個族群的和諧相處，美美與共。

第二，是神經心理學跟人工智能。現在講求工業 4.0，倚靠的是人工智能，讓電腦模擬人的意識與思維，並以類似人類思考的方式進行運作，因而需要更講究與深入瞭解人的心智運作與意圖，獲得更詳盡的心理歷程與神經機制的基礎知識，並透過軟硬體與人機介面的研發，擴大種種應用，以改善人類的生活。此趨勢雖是工程學的重要議題，但如果忽略人的認知與行為的探討，將是事倍而功半。這方面心理學可以跟醫學、工程學合作。

第三，是職場心理健康與長期照護。過去臨床心理學做的研究都是以療癒取向為主，處理的是人類的偏差行為。不過，在正向心理學的思潮下，成長取向越來越受到重視，並據此探討人類的高端行為與高峰經驗；同時，需要由個我取向擴展至集體取向，思考個人經驗如何擴展到組織行為與職場心理健康上。另外，長期照護也得從正向心理學的角度來考察，以免過度偏向醫療照護而流於以偏概全。

第四，是組織行為與生態系統研究。這方面的議題相當重要，尤其在臺

灣。從政府組織改造的品質與結果，就可以瞭解臺灣的組織變革與轉型研究與經驗是如何欠缺了，遑論生態體系統的建立。由於人與組織、組織與更大的系統之間都是環環相扣的，牽一髮而動全鈞，而且又涉及時間動態的轉變，因而，相關的研究十分必要，這是組織與管理心理學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

第五，是永續環境跟人類行為。雖然臺灣對永續環境與永續發展的思考不少，但大多著眼於科技角度，十分忽略人性的部分。這種忽略其實是很嚴重的，因為人的心態不變、人類行為、組織行為不變，怎麼可能邁向永續環境。這個部分，心理學研究者也可以貢獻一點心力。

第六，是網路心理學與大數據分析。由於大數據分析是需要建立在人類行為與模式的基礎上，否則光有數據，並無法形成知識，且作為行動策略與政策擬定的參考。最近，我們系也聘請畢業於數學系，經過計算科學訓練的教授，希望透過科際整合，在網路行為與網路心理學上獲得一些具有啟發性的突破。可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型電腦的添購是需要考慮的，因為要進行大數據的分析沒有高速電腦是不可能的。

總之，只要把握自己的方向，努力不懈，一定可以獲得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像過去臺灣的華語文心理學研究與本土心理學的研究都是典型的例子，其成果也都能在國際上發光發熱，引領風騷。最後我用 Kurt Lewin 說的一句話來當結語 “There is nothing more practical than a good theory.” 我們做研究的人就是要發展好的理論，好的理論是最實用的，這是研究者的天職，因為好的理論的確是可以解決社會與人類的實際問題；也建議實務工作者應該善用相關理論與模式來解決實際的問題，才易收事半功倍之效。



圖五：座談會場

## 黃樹民教授（人類學及族群研究）

在《簡訊》特刊裡，我的同仁張珣、劉紹華也各寫了一篇文章來討論人類學的發展，那麼今天我就談談其他面向。我記得最早在臺灣參與學術評鑑工作的時間是 1997 年，那年李遠哲前院長邀請我參加中研院學術諮詢總會，還包括許倬雲、李亦園教授等，一起來探討臺灣人文社會科學面臨的問題是什麼。我們找了很多中研院不同所的資料來看，發現幾個特殊的現象，包括在不同所裡，有人沒有任何一篇文章的刊登，最長的紀錄是一位研究人員 22 年沒有一篇文章。我們為了這件事情討論很久，從一個最粗淺的角度來看，因為中研院鼓勵做基礎研究，並不一定要符合市場的需求，所以研究本身可能需要做得非常深遠，是富有哲學思想的工作，因此不容易有一個研究成果。但是如果 22 年都沒有研究成果，是不是可以預期下一個 22 年也不會有成果。所以，當時我們就討論制定一些方法來做評鑑，當然也遭遇很多批評，尤其是對於長聘制度的提出。假使你不能通過一些門檻，就不能拿到長聘，這也是中研院先推動的。從長遠來看，這應該是對學術發展有很正面的意義，讓學界不適任的人員知道，外面其實有別的機會，你不一定要留在一個你並不喜歡投入的行業裡。另外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那時候中研院各單位會重複購買檔案資料，我們也提了建議，認為應該慢慢修正這種本位主義。

剛才提到的特殊現象，真正的問題在於早年缺少客觀的評鑑制度，對於升等、續聘、調薪等獎勵制度，如何做到公平讓大家都接受，是很困難的。早年，尤其在人文社會科學格外明顯，就是常把精力放在人際關係，而不是放在學術研究。然後藉由這個關係作為他學術發展的渠道，如此一來更難做到客觀的評鑑制度。後來，國科會把評鑑制度慢慢建立起來，之後臺灣的學術發展進入一個良性循環的過程；換句話說，像國科會推動的審查案件用雙向匿名制度或其他方式，便成為一個很正向的發展。另外，我在學界看到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學門之間的界線非常明顯，也就是對其他學門的研究沒有太大的興趣。不只對學門之間的發展不感興趣，甚至是對於同一個學門，但不同領域的研究也不感興趣，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我記得 2008 年，中研院一位國際知名的生物研究學者、也是生物多樣性中心主任李文雄，做了公開演講，談他從 DNA 分析出的一套理論，就是人類第二次走出非洲是什麼時候出現的。這個議題對我們人類學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因為有人提出新的觀念理論，應該是被期待的。但是我去聽演講時沒有遇到民族所的人類學研究學者，我想他們大概是覺得這是生物研究領域的緣故。

然而，人類學是一個很廣泛的學門，可能比心理學還廣，因為我們可以往前追溯至一千萬年以前，尤其從古生物古人類學來講的話，都是我們的研究範圍，當然在這個廣闊的學術範圍裡，人類學家在做什麼，這是我常常在思考的問題。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臺灣學術圈太小，人類學系實際上只有臺大才有，碩博班只有臺大跟清大有，當然像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或政大民族學系有一些人類學的參與，但也不盡然。那麼，在很狹窄的學術圈裡，每個人都認得彼此做什麼研究，於是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比如我是臺大第 11 屆畢業的，遇到你是第 13 屆畢業的學弟，時間再拉長一點，就變成我是老師，你是學生，這種人際關係一擺出來就很複雜和麻煩。再加上我們研究的題目都很小，比如你是研究臺灣漢人社會的宗教，或是臺灣漢人社會的家庭制度，跟別人的研究幾乎可以不相干，於是你成為那個領域的唯一專家，接下來就面臨別人要怎麼評鑑的問題。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的問題可能跟剛才鄭老師提到的問題一樣，由於內部太緊密、圈子太小，每個人都可以走向自己特殊的研究發展，最後找不到一個主軸，到無法繼續下去，就學門的前景來說是蠻令人擔憂的。